



# “中华文明”的学术探源与教学启示

——以2020年全国卷Ⅲ第41(3)题为中心

○李文巍

2020年全国卷Ⅲ第41题,主要取材于白寿彝《中国通史》、黄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这两本经典专业教材。题目材料阅读基本无障碍,问题指向尚属明确,依托高三学生历史学习的主干知识。材料围绕“上古时期的中外国家治理”这一主题,考查西周和古希腊的城市治理的差异性。与2019年相比,2020年试题是熟悉的配方,味道略有差异:两年试题调整了时空条件、设问角度、设问体量等量化指标,均采用“中西对比”的设计思路,都涉及边疆民族关系,探究人类社会何时进入国家形态的关键问题,突出考查早期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虽然关于中西城市“特点”的概括存在抽象性不足,为考生不加分辨照抄材料提供了机会,但是相对而言,关于“影响”的表述似乎值得商榷的地方更多。本文拟采用学术诠释的方式,以“西周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评析为中心,分析史学成果融入高中历史教学的路径。

## 一、关于“开发了边远地区,扩大了统治区域”

与“一标多本”时代一样,统编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强调,西周时期封授王室子弟、异姓功臣、先代贵族,在地方建立世袭诸侯国,并通过逐级向下“封土授民”形成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书中提供的《西周分封示意图》,似乎能够为西周“开发了边远地区,扩大了统治区域”提供注脚。不过,由于教科书对西周诸侯“建国”“征伐”“屏周”的历史细节付之阙如,学生难以推导诸侯封地的“边远”,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今日中国的“腹地”。

命题者通过摘编史料介绍了西周初年的“国

野制度”,这种“补白”深化了一线师生对分封制等西周政治制度的认识,也是以往高考试题中的惯常做法。2017年全国卷Ⅰ第24题,通过诸侯国都城的区位(河南、山东、北京),试图说明分封“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这一提法在“一标多本”时代也有所涉及,例如人民版教科书中指出,分封诸侯使“周的文化形式也因此覆盖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美中不足的是,该题史论结合的程度较差,学生只需运用所学知识结合排除法即可解决问题。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其实不足以回答分封制对周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或者说从分封制到周文化传播之间缺失了一些基本史实的串联。以高考试题的形式,命题者引入“国野制度”这一史学成果,补充说明了分封制等基本政治制度功能的发挥,需要诸多制度与之相协调适应。虽然西周并未与奴隶制决裂,但是在“监于二代”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呈现了崭新的统治风格。周王认识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效仿商朝内外服制,王畿之外实行间接控制乃大势所趋。不过,时叛时附的“方国”是维护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巨大威胁。西周统治者一方面剿抚并用,在镇压殷商贵族反叛、消灭支持殷商残余势力方国的同时,确立了“宅兹中国,自兹义民”的统治原则,更多采用保留殷商遗民社会组织,集中迁徙洛邑居住监视的做法;另一方面发挥血缘纽带的联结作用,分封亲属子弟镇抚地方,巩固和扩大军事征服的成果。这些处于绝对少数的奴隶主贵族,仿照周公营建洛邑之法,发动随征公社民建以“城”戍守,从而形成“国”“野”之分。“国人”往往是与诸侯存在血缘联系的公社庶民,负责殖民戍守与监督劳作,而“野人”则是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居于“城”外农





垦,以供养城内奴隶主贵族<sup>[1]</sup>。这种统治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帆风顺,武装殖民打破了原有政治面貌,威胁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因而往往遭到激烈抵抗。例如,蒲姑氏与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叛周,尽管周公东征时将其消灭,并将其所据之地封给姜太公。据《史记》记载,姜太公却仍“夜衣而行,犁(黎)明至国”,果然不久夷人首领莱侯闻讯赶来,企图趁太公立足未稳,“与之争营丘”。虽然在建国之初备尝艰辛,但是诸侯以强大武力为保障,以周王赐予的征伐权为依据,一方面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注重发展生产,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开发,扩大了西周的经济版图;另一方面树立勤政爱民的政治形象,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又不失时机地传播周文化以“移风易俗”。这些恩威并施的手段,将少数民族逐渐纳入封国等级秩序,封国由此形成拱卫王室的政治实体,从而真正扩大了“中国”的统治范围。

综上所述,西周分封制最初是以武力征伐形式推进的,但政治革新、文化传播、经济发展等和平交流才是最深远、最持久的推进形式,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的缩影。不过,“开发了边远地区”和“扩大了统治区域”的提法,需要依托于更多基本史料,如果能够提供更鲜活的历史细节更佳,例如“拓殖”一词过于抽象,应适度增加对“野人”经济属性的论述,从而说明“国野制度”对“地区开发”的作用,“边远”实际是相对“中心”而言的,而摘编史料并未提供如2017年全国卷I第24题那样地理空间变化的论述。

## 二、关于“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一标多本”时代的教科书,大多突出秦朝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例如,人民版教科书在“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一课中指出:“秦朝大一统政体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本格局”。因此,“西周政治制度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的依据何在?如何理解“西周政治制度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

说法?

2017年全国卷I第47题,围绕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出使中原诸国这一中心事件,展示了西周礼乐文明强大的辐射能力。作为西周初年即已存在的古老封国,吴国并没有在漫长历史时期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反而成为中原文明在江南地区传播的支点,形成了“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文化认同”这一文化融合成果。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夏商周,已然是多民族并存的状态。《尚书》记载牧野之战动员时,武王不仅多次自称“西土之人”,并不避讳周人与“西戎”的民族渊源,而且誓词显示伐纣得到了“庸、蜀、羌”等少数民族武装的有力支持。正如梁启超所言:“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相对于夏商两代对周边民族所建方国的消极承认,西周统治者已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致力于塑造“天下共主”的意识形态。虽然无法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度相提并论,但是周天子与各级贵族之间,还是通过统治权力的逐级授予,初步构建了后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雏形。正如刘正寅所言:“中华民族在其起源时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sup>[2]</sup>周王沿袭夏商的“天下观”,在坚持华夏中心主义的前提下,仍视高度独立的“四夷”为“天下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强调“五方之民”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迥异,却同属“王臣”的统治原则。西周时期的中国疆域不仅包括其实际控制范围,也应包括受周文化不同程度影响的周边各民族政权控制区域<sup>[3]</sup>。虽然周人的“天下观”不能等同于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但是承认“华夷之辨”相对性的思想倾向,增强了民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可能性,为“大一统”思想提供了心理基础。费孝通指出,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中华民族”以“自在”政治实体的面貌存在,在近代以来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实践中,逐步走向“自觉”的政治实体。西周时期,以华夏族为凝聚核心,以黄河中下游为凝聚中心,以农耕文明为凝聚动力,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sup>[4]</sup>,而对于中原文化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形式<sup>[5]</sup>,这些特质都与西周政治制度的顶







层设计有关。

由上可知,西周通过分封诸侯、血缘联结、礼乐文明等制度构想与政治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感召力。虽然统一多民族国家出现在秦汉时期获得学界广泛认可,但是西周政治制度所蕴含的为秦汉大一统政体奠基的诸多元素,仍具有普遍持久的影响力,两者并不冲突。“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虽然正式形成于近代,但是“中华民族”所指向的政治实体,却根植于三代以来中国古代王朝的治理实践。不过,以上两个说法有学术依据,并不代表答案设计充分合理,主要是“文明”这一概念的定义有上百种,然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一般指人类社会何时进入国家形态,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必须延伸到早期国家起源问题上来,材料中提到“城”的出现即为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不过,由于全国不少地区还在使用旧版教科书,以答案的形式呈现这些与旧版教科书知识结构有较大差异的学术成果,容易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缺乏新版教科书的知识依托,学生难以将“文明”与“国家”进行意义联结,从而提炼出这一答题角度。

### 三、关于“礼乐制度与儒家学说、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形成”

一般认为,礼乐制度可以追溯到上古先民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不过,相较于商代政治神权与王权的高度结合,一切军国大政的决策都取诸占卜所呈现的“天命”,西周统治者虽然也认同只有掌握“天命”的解释权,才能增强君主获得和继承王权的说服力,才能构建“尊卑分明”等级秩序的合法性,但更加强调“周礼”的教化作用,依托“都城”中设立的宗庙社稷,开展定期祭祀共同远祖的活动<sup>[6]</sup>,提供了规范贵族等级秩序的契机,通过仪式反复明确不同个体在家族谱系中的地位,建立“家国同构”政治框架下个体政治权力的合理心理预期,从而对抗“代远情疏”可能滋长的利益冲突,维持世袭贵族集团的内部认同。

2013年全国卷I第25题指出,汉唐之间儒学被称为“周(公)孔之道”,这一方面说明了周公

及“周礼”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奠基作用,另一方面也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儒学的传承谱系。即使西周的典章制度不可能全为周公所作,也不可否认其典型意义。虽然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但是孔子对周礼的理论化,推动“周礼”走向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sup>[7]</sup>。商周时期,“儒”本以“治丧相礼”为业,孔子也不讳言“儒”与巫、祝、史相似的职业源流。孔子之所以被广泛认可为儒家创始人,主要在于开创了“以述为作”的学术传统,通过对《春秋》《尚书》等典籍的理论阐发,努力淡化卜筮色彩,突出“周礼”蕴含的道德教化功能<sup>[8]</sup>。虽然后世儒学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其他学派、宗教的思想成分,但是西周政治伦理中的“敬天保民”“为政以德”“明德慎罚”“协和万邦”“崇孝尚友”等基本原则,仍为不同时期儒家治国方略的核心价值观<sup>[9]</sup>。

虽然西周时期的政治结构与秦汉以后的中国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者之间的继承性也不容忽视。“中国长时期政治结构稳定”这一说法,较大程度受20世纪80年代金观涛、刘青峰夫妇提出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影响。这一学说引入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成果,着力于探究王朝不断周期性崩解而中国封建社会却长期存在的原因,指出“政治结构”指向社会和国家政治组织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结构”则往往外化为统一的信仰和国家学说,而官僚机构则是两者共同的组织力量,共同抑制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体现的分散性对大一统的瓦解作用,形成排斥分裂倾向的一体化社会结构<sup>[10]</sup>。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之所以长期延续,宗法观念的调节、封建地主经济的奠基、发达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学说的权威加持,赋予了中华政治文明巨大稳定性,即使因“无组织力量”增长而滋生社会结构调节机制的异化,只能通过周期性社会震荡抵消不稳定因素,从而恢复一体化组织的社会动员力,也无法改变“大一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式。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大一统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塑造了“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也铸就了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超稳定结构体”<sup>[11]</sup>。





由上可知,西周政治制度对后世社会结构影响深远,不仅体现为西周的礼乐制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托,而且宗法制“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沿袭。参考答案的设计也是有所本的,由于材料提及“宗庙”“社稷”“都城”等礼制象征,所以结合所学联想先秦儒家重“礼治”的特点,应该并不困难。虽然材料提到都城修建大多继承西周传统,但是无法直接推导出“政治结构的长期稳定”这一结论。另外,金氏的“超稳定结构”假说由于突出“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的并列关系,而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作用之说相背离,加之对应用系统科学原理的引入多有逻辑不能自洽之处<sup>[12]</sup>,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面世时已颇滋物议,将这种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有出入的学术成果引入高考试题,虽然为一线师生提供了历史学习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但是否会冲淡核心素养的考查力度,似乎有待考查。

#### 四、小结

虽然命题者反复宣称主观题的参考答案仅供参考,但是各地阅卷团队制定的评分细则都以其为基本依据<sup>[13]</sup>。主观题的参考答案当然需要“结合所学”,不过这些“所学”如果缺失了史料合理巧妙的线索提醒,使学生难以展开联想,那么就更容易影响试题的区分度。随着新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这两年的全国卷主观题大量采用了新教科书必修和选择性必修的教学主题和史学结论,希望以此深化一线师生对新教科书的理解。不过,主观题参考答案设计也要讲“基本法”,不能为了体现史学成果融入而强行而为。既然材料是精心剪切和反复权衡的,那么答案的设计更要追求思虑周全:一方面要源于教科书,又高于教科书,从而超越和引领高中历史教学;另一方面必须“持论有据”,方便一线师生消化吸收史学成果,使其成为高中历史教学的有益补充。另外,新高考背景下各省历史考试又重新回归自主命题,不过全国卷学术气息与时代气息并重的命题风格,仍然是各省命题的标杆。高考试题不能仅停留在简单褒贬评价中,而应抱着“与

命题者对话”的心态,吸取这些试题的经验教训,并将其反馈到日常命题和历史教学中,诊断性考试的命题过程也要注重评分细则的制定,在引领教学的同时不忘关照学情。“西周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这一设问,体现了命题者对“家国情怀”的追求,展示了命题者深刻的经世意识,刻画了“中华文明”这一学科大概念的统领作用。虽然答案设计略有脱离材料的嫌疑,但是追溯往年高考试题,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些答案设计的命题立意,而细细阅读《中外历史纲要(上)》又可感受到命题者引领历史教学的良苦用心。不过,沉重的学业负担,使得高考试题成为高中学生史学阅读的主要途径<sup>[14]</sup>,这就要求教师以核心素养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为,以试题之间概念源流的学术化诠释为中心,以具有更加高妙统摄功能的学科“大概念”为引领,对所占有的感性材料进行价值判断,特别是新旧教科书的课程内容要大胆扬弃,从而有所取舍地呈现高质量的史学阅读成果,促进学生“考学结合”观念的树立,通过对高考试题的体悟,既扩大学生的史学视野,增加史学积累,又注重提升信息转化能力,尝试在具体时空条件下探究历史现象的本质。

- [1]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02.
- [2] 刘正寅.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与发展[J].民族研究,2000(6):68-76.
- [3] 李大龙,铁颜颜.“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J].思想战线,2020(3):43.
- [4]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
- [5] 马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1999(2):11.
- [6] 苏力.大国及其疆域的政制构成[J].法学家,2016(1):31.
- [7] 殷志.“礼乐制度”的合法化及其作为文化的衍进[J].贵州社会科学,2018(5):18.
-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60.
- [9] 付传.西周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哈尔滨:黑



# 开放式历史材料题的题型特点与解题思路

## ——以深圳市中考历史题为例

◎ 吴若盘

从2018年起,在深圳市发布的中考考试说明中,历史学科的考试目标连续三年都为如下表述:“能够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初步掌握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并以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达与陈述;能够将正确的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具备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表明中考历史学科注重考查考生发掘历史现象、提出历史观点、论证历史问题、评析历史事件、阐明历史价值观的能力。为了有效落实此项考试目标,考试说明引用一道开放式材料题进行示范说明。此题集识记、释读、论证和评析于一体,可见对备战中考的师生而言,颇有难度。

### 一、题型特点

先看考试说明连续引用三年的开放式材料题:

(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汉时期,从中国向西延伸的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

龙江大学,2012:155.

[10] 金观涛,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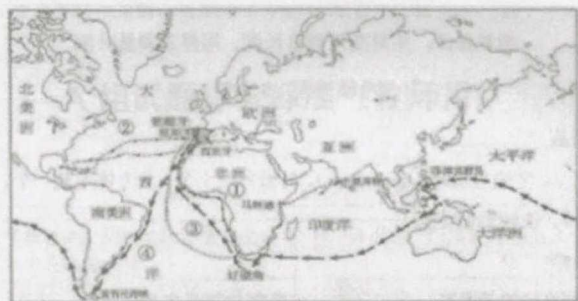
[11] 严庆,平维彬.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18.

[12] 路阳. 超稳定系统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变迁——读《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J]. 学术评论,2012(6):103.

[13] 史凤春. 2019年全国高考文综Ⅱ卷第41题



材料二 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使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



(1)材料一中丝绸之路的开辟对汉代社会有什么影响?(2分)材料二中新航路开辟对欧洲经济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2分)

(2)结合所学知识,从材料一、二中提取信息,自拟一个论题并展开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8分)

2018年、2019年深圳中考历史卷第33题完

(历史)评析[J]. 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9(9):21.

[14] 夏仁贵,税光华. 高考试题中两种现代化模式考点的因果逻辑——以2019年全国卷Ⅲ为例[J]. 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9(9):20.

【附记】本文系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基础教育研究专项)课题“概念史视角下的高中历史核心概念教学”(编号:JZ1802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福建教育学院资助)。

(作者地址/福建省长汀县第一中学,366300)

